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遗产学术丛书

卫道之学

——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

张斯珉 著

Weidao Zhixue
Mingru Gengdingxiang Sixia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遗产学术丛书

卫道之学

——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

张斯珉 著

Weidao Zhixue

Mingru Gengdingxiang Sixia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 / 张斯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5203-0721-5

I. ①卫… II. ①张… III. ①耿定向（约 1524 - 1597）—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881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陈晨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28 千字
定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儒家
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代德性教育内在机
理研究”（15YJC710073）阶段性成果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传承学术丛书编委会

主 任：陈治亚 郑晓静

执行主任：龙建成 李建东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为祥	丰子义	尤西林	方光华	王若冰
王南湜	史少博	孙正聿	成中英	齐 林
吴建新	宋宝萍	张 蓬	李佃来	李景林
李德顺	陈德光	郭宝龙	赵汀阳	夏永林
常 新	黄 平	韩 伟	赖贤宗	漆 思

主 编：漆 思

执行主编：郁志强

序 言

乔清举

耿定向是明代中后期的重要思想家，也是阳明心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耿氏兄弟列入泰州学派，但事实上耿氏兄弟学无常师，与泰州学派并无明确的师承关系，只是在思想脉络上与王心斋“日用常行见道”之说有一致之处。耿定向学术甚少门户之见，既尊崇阳明，也颇为赞成朱子。而对于当时龙溪之学盛行的思想局面，他则敏锐地注意到其中的隐患，提出“卫道”之说，强调通过“礼制”这一客观的、外在化的道德原则规约人的现实行为。他特别突出道德实践在工夫论中的重要地位，以纠正龙溪的偏颇之处。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讲，耿定向可以被视作心学发展的一个“反题”，代表了心学内部对于自身问题的反思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心学和理学对立的理论努力。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耿定向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对他和李贽的争论这一晚明思想公案的分析，在这种研究中，耿定向是以李贽的论敌的面貌出现的，其思想自身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耿李之争诚然是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但仅此远不足以呈现出耿定向思想的全貌；又，现有研究以李贽为中心，偏在把耿定向视作“假道学”的代表，对争论本身也没有达到客观全面的认识。

张斯珉《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一书以“卫道意识”为线索，从心性论和工夫论两方面梳理了耿定向的思想，认为其心性论的核心命题是“真机不容已”，意在凸显道德情感的内在强制性；其工夫论的核心主张是“学有三关”，即认为治学需要经历“即心即道”“即事即心”和“慎术”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本书还介绍了在晚明“三教合流”的大背景下，耿定向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于佛教思想的评价。进一步，作者还从哲学思想和历史观两个角度入手，重新梳理了李贽与耿定向

论争的全过程，指出二人的争论乃是各自思想演进的必然结果，而二人对对方和学术的态度都是真挚的，因此将耿定向视作“假道学”的认识存在着不小的偏颇。本书推进了学界对于耿定向思想以及耿李之争的认识水平，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斯珉基本功扎实，对宋明理学研究有热情；治学态度严谨，假以时日，可成大器，我期待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绩。

目 录

绪 论	(1)
一 耿定向思想研究的意义	(3)
二 研究综述	(8)
第一章 耿定向的生平及学思历程	(18)
第一节 耿定向的生平履历	(19)
一 家世与早岁经历	(19)
二 宦海生涯	(25)
三 耿定向与历任首辅的关系	(29)
第二节 耿定向的思想源流	(37)
一 王艮的泰州之学	(37)
二 仲弟耿定理的启发	(39)
三 罗汝芳当下论的启示	(40)
第三节 耿定向的学思历程	(42)
第二章 卫道意识	
——耿定向思想的理论起点与逻辑线索	(48)
第一节 背景：王学弊端的逐渐显现	(49)
第二节 耿定向对儒家道统的新理解	(54)
一 儒家道统观念的历史沿革	(55)
二 耿定向的新道统观	(59)
第三节 耿定向对儒家正统学者的推崇	(65)
一 对孟子的推崇	(65)
二 尊崇程朱	(70)
三 敬服东廓	(73)
第四节 异端批判：里中三异人	(78)

第三章 耿定向的哲学思想（上）：真机不容已	（84）
第一节 “不容已”的思想源流	（85）
第二节 耿定向对“真机”的界定	（96）
一 性	（97）
二 仁	（102）
三 本心与良知	（106）
第三节 真机不容已：耿定向的不容已之说	（110）
一 由“天道之不容已”到“真机不容已”	（111）
二 “真机不容已”的具体内涵	（113）
三 为学的基础：辨志	（119）
第四节 万物一体：真机不容已的源泉与归宿	（121）
一 达成“万物一体”的两种路径	（122）
二 耿定向对万物一体的理解	（125）
三 以担任地方官为万物一体的手段	（130）
第四章 耿定向的哲学思想（下）：学有三关	（134）
第一节 即心即道	（135）
第二节 即事即心	（142）
一 耿定向对即事即心的理解	（142）
二 批判“耽虚泥无”	（148）
第三节 慎术	（155）
一 “慎术”的经典来源与基本意涵	（156）
二 现成良知：慎术的批判对象	（161）
三 学孔子之学：耿定向的正确之“术”	（171）
四 重礼：孔门之术的另一重价值	（179）
第四节 耿定向与王畿的辩论	（186）
一 前期争论：1564—1565	（187）
二 后期争论：1577—1593	（196）
三 对天台与龙溪之争的小结	（205）
第五章 耿定向论佛	（208）
第一节 摄佛归儒，佛为儒用	（208）
一 以佛释朱陆之别	（210）
二 一心通则无不通	（211）

三 彻上彻下乃为真心	(217)
四 空与未发之中	(220)
第二节 儒佛有别：与焦竑论程颢辟佛	(222)
一 程颢辟佛与焦竑的反驳	(222)
二 耿定向对明道辟佛的回护	(229)
第六章 李耿之争（上）：哲学思想之争	(235)
第一节 李耿之争的大致过程	(236)
第二节 李贽思想的核心：童心说	(242)
第三节 李耿哲学之争的三重面向	(247)
一 孔子思想价值之争	(248)
二 “不容己”之争	(254)
三 人性之争	(261)
第七章 李耿之争（下）：史观之争	(267)
第一节 论赞须具旷古只眼：李贽史论的核心要求	(267)
第二节 卫道意识的延伸：耿定向论史的主要特点	(274)
第三节 冯道：李耿史论之争的焦点	(278)
一 宋代学者对冯道的不同看法	(278)
二 李贽对冯道的称赞	(281)
三 耿定向对冯道的批判	(283)
第四节 对李耿之争的小结	(287)
结 语	(289)
一 耿定向思想的意义与缺失	(289)
二 对《明儒学案》中对耿定向评价的再思考	(292)
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309)

绪 论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合适于其时代要求者。……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① 在梁先生看来，一国之思想受到时代与环境的影响，在特定的时期会产生某种占有主导地位的学说，宋明理学便是其中之一。进一步，梁先生认为，思潮自身亦存在着流转变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启蒙期，二、全盛期，三、蜕分期，四、衰落期。启蒙期的特点在于对旧思潮的反动，“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全盛期是新思想的主要建设时期，“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蜕分期为思想分化、细化的时期，学者“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最终，思想迎来了自身的衰落期，一方面“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另一方面，“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②，因而此思想最终走向了死亡，同时也进入另一思潮的启蒙期。

梁先生此论精当地概括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明代思想发展过程的工具。黄宗羲曾云：“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①在梨洲眼中，理学（这里指广义的理学）可谓是明代的“名片”，它不仅是当时思想界的最强音，而且还对明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明代理学的核心是心学，甚至可以说，明代思想发展的主线即是心学自身的展开以及心学与狭义的理学相互争论的过程。在笔者看来，这一过程同样可分为四个阶段：启蒙期乃是指王阳明和湛若水之前的心学，它表现为对于程朱学的反动，其代表人物是陈献章。全盛期很显然是指阳明和甘泉的心学，此二人乃是明代心学的建设者，将心学推向了极盛。蜕分期乃是王湛二人的弟子特别是亲炙弟子活跃的时期。以王门为例，王畿、钱德洪、王艮、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等人都选取了乃师思想的一个面向作为本人的学术宗旨，并以此来品评同门，这正体现了王门的分化与细化。伴随着嘉靖以来日趋高涨的讲学之风，王门内部的论战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深化阳明思想的同时也造成了王门的分裂。此外，在这一时期，王门与湛门之间，乃至心学与理学之间的分歧也越发明显。衰落期是心学的异化与解体期，心学特别是王学左派的发展，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狂禅”的泛滥，说明心学末流已经背离了儒学的本旨，进而导致了传统价值体系遭到瓦解，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可以说，心学的衰落表现为晚明时期思想与社会的双重解体，并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了终点。

以上笔者按照梁先生思想发展四阶段的划分，简要勾勒了明代心学的发展脉络。若从时间上划分为四个阶段，笔者认为，启蒙期是王湛两人思想成熟之前，应截至孝宗弘治年间。全盛期自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始，贯穿于武宗一朝，一直延续至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即阳明逝世之时。^②蜕分期则贯穿于嘉靖年间，此时也是明代讲会的勃兴之际，大的讲会如青原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中华书局2008年标点本，第14页。

^② 根据《阳明年谱》记载，弘治十八年“先生在京师。是年先生门人始进。……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标点本，第1226页）。可见，这一年对阳明而言意义非凡：首先，他开始开门授徒；其次，这一年他结识了湛若水，得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论学之友。当然，此时的阳明还未经历龙场之悟，也没有确立“知行合一”之旨。然而，这一年孝宗病逝，第二年（1506年）即是武宗正德元年，时年阳明因触犯刘瑾而下诏狱、廷杖并谪守龙场，龙场之悟则发生在正德三年（1508年）。换言之，弘治十八年的阳明，距离自己在学术上最大的突破只有三年，因而这一年至少可以视作王学全盛期的开端。而从“天泉证道”中我们即可发现，阳明的弟子在阳明生前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学术分歧，阳明死后，这种分歧日趋明显，王学亦开始细化。因而，笔者将阳明逝世之时视作心学全盛期的终结。

会、水西会都产生于此时。^①以王门为例，借助于讲会和书信这两种媒介，阳明弟子就“无善无恶”及如何致良知等问题展开了往复的辩论，从而使得王门的分化变得十分明显。至于蜕分期的终点，笔者认为难以严格界定，但与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年）下令毁天下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时，王学流弊开始显现，讲学者又被张居正视作推行新政的阻碍而遭到打压，多重作用下王学乃至整个心学的衰落已不可逆转。衰落期则应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建东林书院起，它标志着东林党人作为明末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有感于王学流弊丛生，东林学者治学多主融会程朱陆王，强调做实地工夫。这一思潮一直延续到清初，梁启超先生将清代思潮概括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②，并指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点乃是清代思潮的先声。笔者则认为，这同样是心学走向终结的信号。

需要说明的是，四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若干过渡期。相比于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过渡期中的人物往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更加值得我们研究。在笔者看来，活跃于嘉靖、万历年间的耿定向便是一个存在于过渡期的人物。此时，心学正由蜕分期向衰落期转变，王学末流的问题已经逐渐显现，耿定向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学说以“卫道”为宗旨，就是为了纠正心学流弊，挽救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揭示耿定向卫道之学的具体内容和学术价值，有助于我们理清明代后期王学的发展脉络，进而找寻王学乃至心学衰落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一 耿定向思想研究的意义

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湖北黄安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举进士，擢监察御史，巡按甘肃，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督南直隶学政，后历任大理寺右寺丞、横州判官、右副都御史、刑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致仕后居家讲学，卒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享年73岁，赐

^① 关于嘉靖年间讲会的发展，请参看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太子少保，谥恭俭，《明史》卷221《列传第一百九》有传。

在前文中，笔者基于梁启超先生对于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的划分，认为耿定向乃是阳明心学由蛻分期向衰落期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考虑到以下两点：一是耿定向生活的年代，二是他与其他学者的交往情况。对于前者笔者认为，耿定向活跃于嘉靖中晚期至万历中前期，这也恰好是心学由盛转衰的时代。他曾参加过嘉靖年间南京的讲会，也亲历了张居正毁书院的过程，并为江陵的行为作了辩护。^①可以说，他本人的学术活动与整个学术环境的转变是同步的。至于后者，我们发现，耿定向的交往十分广泛。具体而言，首先，当耿定向的思想逐步成熟之时，阳明的亲炙弟子已经相继离世，然而他们的影响并未消散，天台与某些蛻分期的代表人物还能保持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②具体而言，直接交往以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为代表，间接交往则主要指他对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的了解。耿定向与王畿有数次会面，且有书信来往，因可以说二人有着直接交往^③；相反，耿定向与邹守益并无书信往来，亦无缘

① 关于耿定向与张居正的关系，后文将有专门的分析。

② 邹守益卒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欧阳德与黄绾卒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艮卒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聂豹与季本卒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罗洪先卒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钱德洪卒于万历二年（1574年），王畿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耿定向则是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才中进士，而其与胡直、耿定理“汉许定宗”确立自己的学术宗旨则更是发生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可见，当天台的思想相对成熟之际，阳明的一传弟子多数或已经去世，或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似乎只有王畿依旧活跃在各地讲会上，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阳明的一传弟子之中，耿定向能够面见的只有龙溪。

③ 根据现有材料，耿定向与王畿至少有两次会面。第一次乃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王畿《东游问答》的记载是：“不肖辱学院楚侗子之知，神交十年，每问讯相期，未由睹面。甲子暮春，予赴水西之会，道出阳羨。时楚侗子校文宜兴，晨启堂吏人报，矍然离座曰：‘异哉！’亟遣有司谕意，出访，握手相视，欢若平生。……乃相待为张公、玉女之游，舟中宿证悟，颇尽请益之怀。”（《王畿集》附录二《东游会语》，凤凰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716页）王畿明言这是他首度见面耿定向。耿定向自编的年谱《观生纪》的记载如下：“四十三年甲子我生四十一岁。正月巡淞江还，驻立兴，校常州、镇江二属，便校溧阳毕。时王龙溪至，因偕游张公洞，连榻晤语。”（耿定向：《观生纪》，《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5册，第304页）这也是耿定向的年谱中首次出现与王畿会面的记录。第二次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两人会于南京。此次并非两人的单独会面，而是他们共同参加南京的讲会，在讲会上二人有争论（关于争论的具体内容请见第四章）。然而关于这次会面的记述只存于《王畿集》中，《观生纪》却只字未提。（参见《王畿集》卷4《留都会语》，凤凰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89页）另外，《王畿集》中有题为《答楚侗耿子问》的一段语录，但未说明时间，甚至未说明这究竟是两人会面时的讨论还是书信讨论，《观生纪》中亦未言明。至于两人的书信往来，根据现有材料可知，王畿写给耿定向的信有三封，耿定向的回信有两封，载于《王畿集》及《耿天台先生文集》之中。

面见东廓。除了阅读邹守益的著作外,天台主要是通过与其季子邹善以及邹善长子邹德涵的交往,间接地了解邹守益的学术。^①其次,与耿定向同时代的学者多是王门后学,如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胡直(1517—1585,字正甫,号庐山,江西泰和人)及邹善^②。严格地说,这些学者应属于蛻分期末尾的人物,他们的理论贡献在深化王学的同时也意味着王学即将充拓殆尽。换言之,阳明心学的细化与分化已接近终点。^③最后,耿定向与李贽的争论乃是晚明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而李贽则被视作鼓噪狂禅的代表,以及将学者引向恣意妄为的罪魁祸首,遭到了不少明末学者特别是东林学者的严厉批判。众所周知,耿定向同样批判过李贽,这就意味着,以李贽为中介,天台与明末学者在思想上有着暗合之处。通过耿定向的学术交流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确生活在心学的理论创造趋向终结而问题逐渐显现之际,也就是心学由蛻分期向衰落期过渡之际。

就耿定向本人而言,他是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为官清廉,颇有政声,且资性平和。其学与阳明弟子王心斋所创之泰州之学相近,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天台已经察觉到了心学由盛转衰的趋向,因此,他以“卫道”为己任,力图恢复心学的本来面目,扭转虚无放诞、灭弃礼教的世风。从这个意义上看,天台可称得上心学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另外,天台在督学南京时着力简拔人才,从学者甚众,其中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澹园,南京旗手卫人)、刘元卿(1544—1609,字调甫,号旋宇,江西安福人)、管志道(1536—1608,字登之,号东溟,江苏太仓人)都在晚明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耿定

① 耿定向回忆道:“颍泉公(邹善)既成进士,官比部,以伯子(邹德涵)从。余慕颍泉公家学,于同年中心独向往,时时偕罗惟德(罗汝芳)、胡正甫(胡直)辈相与切劘。而颍泉公准古易子谊,令伯子受学于予,盖伯子时已脉脉嗜学矣。”(耿定向:《明河南按察司金事邹伯子墓志铭》,《耿天台先生文集》卷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309页)按,此中提到的易子而教的说法出自《孟子·离娄上》,“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耿定向与邹善同年举进士,邹善又要求长子邹德涵拜耿定向为师,可见天台与颍泉的关系是极为亲密的。可以想见,这为前者了解邹守益的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

② 胡直曾师事欧阳德与罗洪先,是阳明的二传弟子。罗汝芳转向心学是在拜颜钧为师之后,颜钧曾师事王艮,因而近溪当为阳明的三传。

③ 以罗汝芳为例,吴震教授将其界定为“泰州学的终结”,认为他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泰州学者(有别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于泰州一系的划分)中具有理论创造的最后一人。此论可谓有见地。(参见吴震《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向与李贽的争论则作为晚明思想史的一段公案为人们所熟知。总之，耿定向是明代中晚期思想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值得深入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耿定向卫道之学在晚明思想史上的地位

“卫道”是耿定向哲学的最终旨归，也是其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所谓“卫道”，顾名思义乃是捍卫儒家的道统，批判违背儒家正统思想的学说。面对王门后学“跻阳明而为禅”而“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现实，天台毅然举起“卫道”的大旗，一方面继承阳明和心斋的思想，另一方面着力纠正心学的种种流弊。

耿定向论学宗旨是“不容已”，它强调人的内心中存在着不可遏止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表现于外即是合乎礼仪的行为。他的“慎术”说特别指出孔子之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要求学者“志伊尹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其真正目的则是要求学者重视对于道德条目及礼仪制度的学习，以此作为区别“良知”与“情识”的依据。有鉴于此，天台对于朱子推崇备至。在心学鼎盛的嘉、万时期，天台此论确实有别于他人。事实上，朱子吸引天台的是其“道问学”的实功，这意味着天台已经产生了以阳明学为主体来涵摄朱子思想的要求。基于此，耿定向与当时王学之盟主——王畿展开了论战，指出龙溪的“四无说”及“破除毁誉”的要求很容易被人所误解，从而导致“高者耽虚泥无，卑者放荡无耻”的后果。应当说，这些都是很深刻的洞见。

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耿定向始以监察御史之职督南直隶学政。对于以“卫道”为己任的天台而言，在南京这样一个人文荟萃之地主掌教育大权，可谓得偿所愿。在此，他简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同时其“卫道”的学术主张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使得这些学者治学偏向于平实和广博，其中的代表是焦竑、刘元卿与管志道。焦竑乃是明代重要的考据学家，其治考据学的目的是“博文以约礼”，即通过广博的学习与考证来明心见性。刘元卿坚守其师的卫道之学。管志道则一方面提倡“三教合一”，一方面又坚持维护道统。焦、刘、管三人的思想都深受乃师的影响，是其卫道学说的进一步展开。

综上所述，耿定向在晚明乃至明代思想界都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卫道”之学代表了阳明心学对于自身流弊的自觉反省，是心学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环。东林学者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号景逸）

便十分推崇天台的思想^①，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先生更是将耿定向视作“明末知识界的代表人物”^②。因此，研究耿定向的思想对于我们了解晚明思想的演变历程，理清心学自身的发展逻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李耿之争带来的误解

耿定向与李贽的争论持续了12年，它成为人们了解耿定向的一个窗口。20世纪以来，李贽被学界视作反封建的旗手和个性解放的象征，得到了充分的研究。相反，耿定向的思想则少有人问津，这就使得“人们往往是透过卓吾来窥看天台，对其思想本身似乎并无关注的必要”^③。不可否认，李耿之争确实是耿定向思想中的重要一环，然而，以此作为理解天台的唯一向度不仅很难展现天台思想的全貌，而且会造成严重的误读。

首先，论战本身即决定了耿定向只能在某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展开自己的思想，不可能反映其学说的全貌。笔者认为，李耿之争主要包括哲学思想之争与历史观之争，前者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即如何理解孔子之学的真正价值，如何认识“不容已”的真正内涵，以及如何看待人性的本质；后者则集中体现在两人对于冯道的不同看法上。这些只涉及耿定向思想的部分内容，并未包含诸如“不容已”说、“慎术”说以及天台对于佛教的评论等重要领域，因而是片面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对于李耿之争的主流理解是将其视作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与反封建的斗士、虚伪的道学家与反道学的思想先驱之间的争论。如容肇祖先生认为李贽“在十六世纪末是我国反封建的启蒙思想的先驱，这样，他和主张维护封建道德的道学家耿定向，自然是相对立的”^④。侯外庐先生也指出：“李贽特别憎恶假道学如耿定向之流的言行不相顾。……李贽的言论（按，指《答耿司寇》一文）直截了当地扯下了道学家的假面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所御用的道学家的权威。”^⑤显然，这些言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显著的倾向性，并不能反映李耿之

① 管志道：《答高大行景逸文书》，《问辩牍》卷4贞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8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32页。

② [日]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4页。

③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④ 容肇祖：《李贽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页。

⑤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页。